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主编 尹绍亨 夏代忠

# 民族考古学探索

## An Exploration of Ethnoarchaeology

汪宁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主编 尹绍亭 夏代忠

# 民族考古学探索

汪宁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考古学探索 / 汪宁生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ISBN 978-7-222-05495-0

I . 民 … II . 汪 … III . 民族考古学 - 研究 - 中国 IV .  
K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492 号

出 品 人：汤汉清

策 划：尹 杰

责任编辑：尹 杰 李锦雯

特约编辑：李惠铨

装帧设计：王曦云

责任校对：博 林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民族考古学探索
作 者	汪宁生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4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495-0
定 价	58.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 总序

尹绍亭

关于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对人类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它有英美等国的广义概念和德奥等国的狭义概念之分；民族学（ethnology）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化。大致而言，德奥等国的民族学即相当于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派之中，对于民族学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舶来的学科，其状况类似日本，虽然学界同时使用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名称，然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本丛书名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即沿袭我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长期并用的惯例。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文化或人类行为的学问。具有文化和学习文化的能力，是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文化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使得文化的学习成为人类终生不可缺少的功课，正因为如此，文化的研究便不可或缺。人类学在发达国家之所以为社会民众普遍熟悉和重视，并始终被作为大学基础教育的学科，原因即在于此。然而，当前该学科所显现的稳步趋热的现象，却另有缘由。

在当代社会，崇尚工业与信息、物质和技术，文化往往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然而许多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重大的危机、纷争和问题，根源却非工业信息和物质技术，而在于文化。例如现在有的国家因捕鲸而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而当事国却不甘示弱，认为坚持本国的“文化传统”无可非议；又如西方国家惯于攻击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展中国家则以“应理解和尊重国别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予以回应，政治性的指责被判别为文化的偏见；再如时下全球变暖危及人类生存成为热门话题，如果追究人为的因素，那么工业文明的弊端无疑就是“罪魁祸首”。此外，君不见中东战火无

穷尽，生灵涂炭灾难深！有人说那是石油的战争，而“文明冲突”的解释，却令人耳目一新。国际大事如此，国内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和出现的种种问题，亦无一不与文化相关联。面对当代社会的困惑，文化的审视和诠释显示出了无可取代的魅力。那么作为致力于文化法则研究的不同于一般文化学的人类学因此顺势而兴，渐露显学之态，也便不足为奇了。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可用四句话加以形象的概括，那就是“生于动荡，立于国难，少壮挫折，中年复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引进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其时军阀割据，动荡不安；此后抗战八年内战四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们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辛勤耕耘，筚路蓝缕；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竟被看做资产阶级的学科而取消；80年代改革开放，清除了“极左”思潮，人类学民族学才得以恢复和繁荣。沧桑百年，斗转星移，现在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可以说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虽然如此，然而如上所述，面对当前国内外悄然兴起的文化自觉和无所不在的文化诉求，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无疑承受着巨大的挑战。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进行学科的建设，如何在融入国际学界的同时努力实现本土化，如何普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以提高国民的教养和素质，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应用研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均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课题如山还得从基础做起。就学术事业而言，优秀成果的产出和积累始终是重要的基础工作。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多年来笔者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同时，也先后负责主编过几套丛书，为促进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添砖加瓦。此次云南人民出版社秉承奉献社会、光大学术的一贯宗旨，不惜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决定出版“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我们能参与其事，感到十分荣幸。学术贵在创新，一套好的丛书也必须有独到的创意和追求。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第一，尽可能汇集老中青几代学人的作品。如前所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纵观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人类学民族学丛书，还没有系统地反映上述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成果集成，这是一个缺憾。当然，现在要弥补这个缺憾是比较困难的。众所周知，第一代人

类学民族学家大多已经辞世，除了他们广为人知的经典著作之外，欲搜寻其传世很少或者未曾面世的遗作，困难不小。所幸的是，本丛书觅求到了那一时代几位著名学者的大作：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方国瑜先生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梁先生的《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三位先生的大作虽然不可能充分反映同时代学者的业绩，然而毕竟使丛书增添了中国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的光辉，而且其时学者们的学风、学品、学问已昭显于其中。20世纪50年代成长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目前健在者尚多，不过多已迈入古稀之年。他们长年的耕耘积累，大多整理出版了；但身手尚健，老骥伏枥，志趣不减，把握潮流立足前沿笔耕不辍者，已屈指可数。令人欣喜的是，恰恰是这一代学人中的几位有影响的学者，为我们奉献出了其代表性的著作：汪宁生先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杜玉亭先生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女士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数量也仅为三册，虽然远远不能反映同代人的伟业，然而作为承前启后的桥梁，那一代学者的理论功底和田野调查的水平也足可窥见一斑。有了上述两代学者的作品的支撑，加上选择相对容易的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纵向的系列，这可以说是本丛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关照了当代多样性的学术取向。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草创发展阶段，老一辈学者们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优选国外的理论，通过创造性地应用，较快地实现了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形成了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尊敬。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可参照选择的理论方法还不多，仅为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等。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受“左”的影响，人类学民族学被误解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取消。然而其时学术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此领域和相关专业的许多学者实际上仍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事着民族调查与研究，但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基本断绝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善，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众多理论方法迅速被引进，新的理论流派令人目不暇接，犹如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错综复杂，蔚为壮观。本丛书的选题，注意到了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取向多样性的特征，除了有历史、考古、生态、经济、饮食、认知、象征、宗教、婚姻家庭、政治、

艺术以及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著作之外，还特别组织全国的学者编写了包容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的《现代民族学》和全面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部综合性著作的写作，也力求有所突破。国内以往的概论和通论，皆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者的著述，完全是外向的视野。而这两部著作则不落窠臼，在进行国外理论流派梳理的同时，亦重视本土学术成果的整理和研究。关照了当代多样性的理论取向，使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互融，并重视本土研究成果，形成了本丛书的又一个鲜明特色。

第三，个案研究、跨文化比较和宏观理论研究兼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范围十分宽广，内涵极其丰富，其研究和写作的样式自然也不拘一格。然而，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必有其专门的研究视角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人类学民族学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其基本的与众不同的研究途径便是田野调查的实证方法。迄今为止，该学科能够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即多为此类作品。时下标榜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拼盘”“杂烩”式的作品不少，看似时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伪劣，说穿了那不过是逃避田野的障眼之法。本丛书对此类著作自然不感兴趣，所选专著绝大部分即为深入扎实的田野实证之作。而田野研究又分为两类，一类为定点的个案研究，另一类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本丛书之中，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杜玉亭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杨福泉的《殉情之都——纳西族的殉情研究》，郑晓云的《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等，便是个案研究的规范而扎实的作品。跨文化比较研究，在本丛书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尹绍亭的《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郭家骥的《发展的反思——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变迁的人类学研究》等，即属此类。我们说人类学民族学是实证的学科，所谓“实证”，那就是用从田野获取的资料和研究来验证理论。以微观洞察宏观，以特殊阐释普遍；反之，从宏观探究微观，从普遍解读特殊。该学科所做的学问，就是这样的田野和理论的互动循环。由此可知，除了田野实证研究之外，宏观的理论研究也不可或缺。为此，本丛书特别选编了《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宏观性的理论

著作。两书的作者们均以开阔的视野，结合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整理阐释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流派。基本上满足了编者欲统筹田野和理论两类著作从而扩大读者面向的策划编辑思路。

第四，写作队伍来自全国，阵容可观。本丛书既然称之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汇聚全国的学术精英加盟执笔，就应该尽可能地体现全国同行的优秀成果。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短时期内欲在全国全面组织书稿殊不容易；且由于丛书规模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第一批专著只能以云南学者的作品为主。而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扩大其代表性，本丛书特别邀约了全国各地数十位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共同撰写《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书稿，此举可谓学坛一大盛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目前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弊病，是缺少深度的交流和正常的批评。交流流于形式，批评误作攻击，均非正常的现象。而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或文人相轻、争名夺利的陋习，无疑是阻碍深入交流和正常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丛书有意识地扩大作者队伍，除了提升作品质量和扩大丛书代表性的考虑之外，亦有贬抑学界不良风气，提倡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实事求是的做人和治学的目的。

以上说了编者在策划组织丛书时的几个方面的追求，它们当是此套丛书的新颖和特色之所在。当然，作为学术著作，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质量。关于这一点，可留待读者慢慢品评赏析。如果能够多一些反响和批评，那是编者和作者求之不得的。作为编者，还希望能将此套丛书继续编辑下去，这样不仅可以弥补不足，而且可以开拓新的领域，例如选编中国学者在国外从事研究的著作等。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们，几乎全部选择国内做田野而走不出国门，对此国外学者早有批评。缺乏国外田野的视野，实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差距之所在。当然，这毕竟不是靠学者单纯的努力可以解决的，它还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关系密切。不过近年来国内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捷足先登，选派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到周边有关国家从事长期的田野调查。相信再经过5到10年的时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便能突破田野的“本土化”而进入国际化的时代。

2008年，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将在中国昆明召开。能够承

办这样的盛会，是中国和云南学术界的光荣。那么，作为东道主，我们应该为此次大会献上什么礼物呢？对于学术会议而言，最好的礼物自然是学术成果。古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学者之乐自然莫过于以文会友、交流切磋。在作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本丛书第一批印制精美的著作于大会之前问世，将为会议增添光彩，并将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欢迎。最后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王晓燕社长，多年来，她始终热忱支持和鼓励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令人感动和敬佩；感谢与我一同主编此套丛书的夏代忠先生，在我出国期间，他承担了不少繁杂的工作；感谢负责策划和编辑此套丛书的尹杰学人、责任编辑李锦雯女士以及参加丛书写作的所有作者。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能够组织编辑出版这样一批高水平的著作，而且印刷装帧如此到位，实非易事。本丛书的问世，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状况，作为新时期具有代表性和规模性的研究成果，必将载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史册。

2007年深冬识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 民族考古学论集

费孝通 题

(1989 年费孝通先生为本书初版题写的书名)

## 自序

在国外多种考古学辞典和教科书中，对民族考古学可能作不同的表述，但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作用的界定并无异议。它就是为了考古学目的而进行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考古资料的解释方面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运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诠释历史文献，从而为全面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这一点几成共识。

但在中国，民族考古学尚未完全得到正确的理解。有人似乎以为凡是在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从事考古工作就算民族考古学，把自己一般性的考古论著随意冠上“民族”两字（如《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之类）；并不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单位也可称为“民族考古……中心”。此属于缺乏有关知识，疏于查考，可不必置评。另有个别人士，由于自己著作在民族考古学方法检验之下，破绽百出，受到学术性的批评（参见本书《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一文），便恼羞成怒，竟对民族考古学这一学科加以否定，说它“缺乏自身研究对象”，无存在之必要（参见本书《三谈民族考古学》一文）。对此只想请大家看一下不幸早逝的张光直教授的一篇短文《建议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见所著《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1999），不难判断是非。此文对于为什么考古人要研究民族学，如何利用民族学提供的“蓝图”研究考古学问题（特别是利用考古资料全面复原当时的社会）已有意简言赅的分析。

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开始在中国西南部进行民族考古学研究，备受艰辛。当时中国与世界学术主流完全隔绝，在对外界茫无所知状态下，全靠自己暗中摸索，积累经验。（80 年代初有机会走出国门，才开始接触国外的同行和有关书刊。）学界朋友不以我僻居边地浅学鄙陋而相弃，凡有关民族考古学之作多已在重要刊物上发表。1989 年曾结集一次，名曰《民族考古学论集》，

承已故的费孝通教授题签，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今重加编次，加入近 20 年来的新作，删去前集中不完全属于民族考古学的文字；并按出版社方面的要求，改为今名。实际上它仍是民族考古学论文集的增补本或重编本，当然其面貌已与过去大不相同。

编辑既竟，翻阅归作，感慨良多。虽然目前还在工作，还未放下手中的笔，毕竟是年过古稀，精力日衰，不能再作过多的研究。原来计划中还有很好的题目可从西南民族取得类比材料进行研究者（如酋邦和早期政权、宗法制度、远程贸易等）已难完成。半个世纪过去，在此领域仅留下此寥寥十数篇文字，即再加上以民族学资料的类比考证中国古史的《古俗新研》（繁体字本已由台湾兰台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简体字本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1 年出版）所收，亦不过二十余篇而已。毕生心力耗费于此，而成果如此之少。这除了应归咎自己之因循怠惰外，实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大半生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不安定的时代中度过。历次政治运动，被迫从事不是自己专业的工作和为了改造思想的体力劳动，不知消耗了多少人大好年华。更为不幸的是人们缺乏起码学术自由，一切研究要为政治服务，因言获罪、以文兴狱之事不时发生，即使与现实政治毫无关联的纯学术的研究，也被斥为“为学术而学术”，时遭批判。

现在阶级斗争时代已经结束，转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研究工作又被要求“与经济挂勾”。纯学术的研究，仍然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和支持。此从每年国家社科基金所列选题即可看出。殊不知某些学科是不能对当前社会有什么直接用处的。例如，研究一种已经灭绝的古代文字，注释一部古代重要经籍，专门研究某一朝代的历史，专门研究一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都需要一个优秀学者付出毕生精力。民族考古学的研究也属此类。它们不能创造出经济效益，但它们可以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具有长久的普世的价值。它们的目的就是取得真知，它们的社会功能也就在此。

章太炎先生曾为人题词云：“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顾颉刚先生有云：“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古史辨》自序）。看来，做学问自来有“求是”和“致用”两个层次。做

学问的目的首先是“求是”，即追求真理。假如某些研究取得真知灼见后可应用于当前社会有裨于国计民生（“亲民”），那当然很好。但不能为了谋取自己功名利禄或保全自己而曲学阿世；或像今天一些“学者”为了谋取职称、地位、待遇或项目经费，勉强从事自己并不熟悉的应时的研究而不管能否获得有益的成果；那样就是太炎先生所骂的“干禄”了。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学术界“干禄”的人实在太多！今天大家重温一下上一世纪著名学者这些话，看来很有必要。

在报刊上网络上常见到人们慨叹今天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某些学科水平之下降，甚至远逊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不想从事认真的研究，垃圾文章充斥报刊，抄袭剽窃成风，其原因之一即在于长时期来片面强调应用，而且要求“立竿见影”，忽视和排斥基础性学术研究。每年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取得有价值成果的究有几项？其中能真正产生经济效益的又有几项？每年徒然耗费国家大量经费，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却助长了浮夸急躁、弄虚作假之风。

但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不会完全湮没，学者治学必需具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终将复兴。相信不久的未来人们就会认识到今人的偏狭和缺乏远见，而给“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科学研究以应有的地位。人们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养选择研究的题目，而不考虑利害和得失。那时就会有较多的人来继续研究中国的民族考古学，这本书若能对他们有所启发，便不辜负作者为此学科所做一点“筚路蓝缕”的工作。

汪宁生

2007年岁次丁亥冬月初吉

写于云南民族大学4号楼

# 目 录

## 自 序

## 理论与方法论

谈民族考古学 .....	3
再谈民族考古学 .....	13
三谈民族考古学 .....	19

## 综 合 研 究

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 .....	27
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 .....	83
初民时间、空间及数字概念探源 .....	128
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 .....	158
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 ——对仰韶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 .....	189

几种原始技术的探索 .....	208
谈几种石器的用途和用法 .....	222
再谈史前器物用途用法问题 .....	237
河姆渡文化的“骨耜”及相关问题 .....	252

## 个 案 研 究

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法 ——兼谈中国古代取火 .....	259
---------------------------------	-----

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	276
基诺族的“长房”	314
他鲁人的羊骨卜	
——附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	340
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	
——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	348
佤族铜鼓	374
水、苗、壮、彝诸族使用铜鼓的习俗	390
阿昌族的铁器制作	404
纳西族的仪式用木牌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人面木牌	417
图 版	423

# **Contents**

## **Preface**

##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n the Ethnoarchaeology	3
Th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Ethnoarchaeology	13
The Third Discussion on the Ethnoarchaeology	19

## **Synthetical Studies**

From Primitive Record – keeping to the Invention of Written Language	27
From Primitive Measurements to the Systematics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83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People's Ideas Concerning Time, Space and Numerals	128
The “Large Houses” Discover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hina	158
Yangshao Burial Customs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ome Remarks on the Thesis of “Yangshao Matrilineal Society” and Its Methodology	189
The Exploration of Some Prehistorical Techniques	208
A Discussion on the Use of Some Stone Implements	222
Th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Use of Prehistorical Artifacts	237
On the Bone Spade ( <i>Si</i> ) Unearthed from Hemudo Site	252

## **Case Studies**

Fire – making Methods of Minorities in Yunnan and A Study on Ancient Fire – making of China	259
A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Pottery of the Dai People in Yunnan	276
The “Long House” of Jino People	314
The Sheep Scapula Oracle of the Talu People and a Study on the Oracle Bone and Related Custom of Ancient China	340
The Sheep Scapula Oracle of the Yi and Naxi Peoples and a Further Study on the Oracle Bone and Related Custom of Ancient China	348
The Bronze Drums of the Wa People	374
The Custom of Using Bronze Drums in Shui, Miao, Zhuang and Yi Peoples	390
The Iron – ware Making of A chang People	404
The Ceremonial Wooden Plates of Naxi People and the “Human Face” Wooden Plates Unearthed From Beacon Sites in Northwest China	417
<b>Plates</b>	423